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浙江
史料輯刊
第一輯

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
杭州師範大學

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 杭州師範大學 選編

民國浙江史料輯刊·第一

第一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民國浙江史料輯刊·第一輯/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杭州師範大學選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13-3781-1

I. 民… II. ①民…②杭… III. 浙江省—地方史—史料—民國 IV. K29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99112 號

書名 民國浙江史料輯刊·第一輯(全十冊)

著者 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杭州師範大學 選編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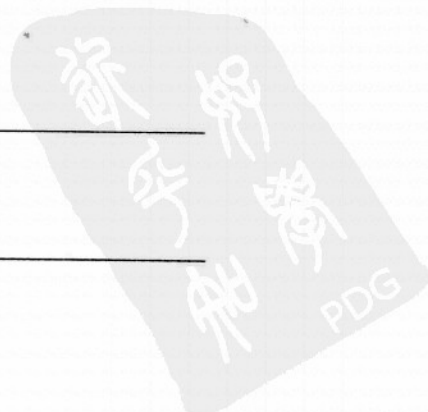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405

版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013-3781-1/K·1719

定價 4800.00 圓



總序

詹福瑞

民國時期，中國處在從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蛻變的一個重要階段。這個時期，政治風雲變幻，思想文化激蕩，內憂外患疊起。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新與舊、中與西、自由與專制、激進與保守、發展與停滯、侵略與反侵略，各種社會潮流在此期間匯聚碰撞，形成了變化萬千的特殊歷史景觀。僅從文化角度考察，一方面傳統文化得到進一步整理繼承和批判揚棄，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強烈地衝擊和影響着當時人們的思想與行爲。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翻譯介紹與傳播，不僅深刻地影響着人們的思想意識，而且直接導致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爆發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巨變。

當此之時，社會政治雖然動蕩不已，經濟脆弱不堪，思想文化卻大放異彩。知識界思維活躍，視野開闊，著述興盛，流派紛呈。加之出版業和新聞業的飛速發展，使民國的出版發行達到空前的規模。短短的數十年間，積累了包括圖書、期刊、報紙以及檔案、日記、手稿、票據、傳單、海報、圖片及聲像資料等等大量文獻。這些文獻作爲此一時期思想文化的特殊載體和社會巨變的原始記錄，不僅數量巨大，可稱海量，蘊涵其間的思想文化價值更不在歷來爲人們所珍視的善本古籍之下。

作爲一個剛剛過去的歷史時期，民國距今時間最近，與當前的現實關聯也最爲密切。因此，對民國歷史的研

究向來為各界所重視。經過近六十年的努力，特別是經過一九七八年以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有關民國史的研究著述和史料大量出版，學術研究隊伍迅速擴大，學術交流活動日漸頻繁。目前，民國史研究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研究諸學科中建立較晚，卻發展較為迅速、取得成就較為顯著的學科，並有逐漸成為國際「顯學」的趨勢。

與學術研究相適應，在既往的半個多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民國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與出版工作，也有很大的推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利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民國各級政府檔案整理出版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和《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根據廈門大學圖書館藏「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整理出版的《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根據遼寧省檔案館所藏檔案整理出版的《滿鐵密檔》，利用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圖書整理出版的《民國叢書》，以及湖北所編辛亥革命史料，天津所編北洋軍閥史料，西南各省所編西南軍閥史料，廣東所編孫中山及南方政府史料，東北所編「九一八」和偽滿史料，上海所編汪偽史料及民族資本企業經濟史料，重慶所編國共關係史料，包括以《國民政府公報》為代表的民國政府出版物，以《申報》、《大公報》、《益世報》為代表的民國報紙，以《東方雜誌》、《良友雜誌》為代表的民國雜誌等等的整理出版，都是這方面工作的重要成果。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臺灣地區也影印出版了以《革命文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為代表的大批民國文獻，為人們瞭解民國社會與歷史，從事學術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

然而，這些整理和出版工作，與民國史研究日新月異的發展以及社會各界對民國文獻資料巨大的使用需求

相比，還存在着很大的反差。甚至可以說，目前民國文獻的傳藏與利用正面臨非常嚴峻的危機。相關調查顯示，由於近代造紙、印刷、裝訂等工藝自身缺陷所造成的先天不足以及各收藏機構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觀念滯後、認識不足、經費短缺、保管不善等原因所帶來的後天損害，使得國家圖書館、歷史較為悠久的公共圖書館以及為數衆多的高校圖書館、科研機構圖書館、檔案館、海外公私藏書機構收藏的民國文獻，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嚴重的老化或損毀現象。以國家圖書館為例，館藏約六十七萬冊民國時期文獻中，達到中度以上破損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民國初年的文獻更是百分之百地破損。研究表明，民國文獻的保存壽命一般為五十至二百年。也就是說，時光流轉到今天，相當一部分的民國文獻已處於行將消失的危急狀態！文獻本身面臨湮滅消亡，亟待搶救和保護，當然也就談不上服務社會，服務學術，滿足各界查閱使用的需求。

針對此等危機，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衆多專家學者多次發出呼籲，號召全社會都來關注民國文獻的「生存現狀」，重視民國文獻的搶救保護與開發利用。以國家圖書館為首的衆多公共圖書館、高校及科研機構圖書館、檔案館，更積極從原生性保護和再生性保護兩個方面，採取了改善保存環境、強化修復手段和加速縮微複製等一系列切實有效的保護搶救措施，並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與更大範圍的老化和損毀現象相比，與保護經費和專業修復人才嚴重短缺、修復手段相對滯後的尷尬、危急狀況相比，這些保護和搶救措施，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國文獻保護傳藏與開發利用所面臨的諸多困難。

從總體的形勢看，及時搶救保護數量宏富的民國文獻，避免我國悠久的文獻傳承歷史出現令人痛心的斷層，切實保障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的延續與光大，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這決非危言聳聽。

作爲國家總書庫、處於文獻保存保護龍頭地位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備感形勢的嚴峻與責任的重大，經過反覆考察論證，在吸收國內外圖書文獻保存保護先進經驗，並對館藏民國文獻進行全面調查摸底的基礎上，決定在繼續推進既有各項搶救保護措施的同時，率先成立『中國國家圖書館民國文獻資料編纂出版委員會』，依據館藏特色、資料類型、瀕危狀況、珍稀程度和社會需求等，進行分類整理，並以『民國文獻資料叢編』的形式，有計劃、有步驟、成規模地陸續編纂出版。決心持續投入大力，通過這種已爲成功實踐所證明的、切實有效的再生性保護手段，在及時搶救保護文獻的同時，也使之化身千百，爲社會和學界提供更爲便利的文化學術服務。相信這項工作的科學有序開展及這套叢書的陸續編纂出版，必將對文獻的保護、文化的傳承、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復興有較大的貢獻。

是爲序。

二〇〇八年一月

民國浙江史概述

一九二七——一九四九（代序言）

從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垮臺的二十二年的歷史中，中國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縱觀這一時期的歷史線索，明顯呈現了半殖民地化過程、革命化過程、現代化過程的多重變奏。一方面，國民黨政權建立後，在維護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權基礎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組織了國家的經濟建設，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另一方面，由於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直接或間接插手，中國嚴重的政治危機和混亂局面始終存在，中國現代化的制度性障礙並沒有真正廢除，因此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繼續高漲。發生於浙江的這段歷史，既印證了與全國其他各省區歷史發展的共性，同時，也呈現了若干浙江的地域特色。

（一）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是極為重視地緣、血緣及學緣等社會關係的。作為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蔣介石是浙江人，這就使浙江在民國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部份民國史，半部在浙江」和「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就是強調了這種重要性所在。

二
PDG

蔣介石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在浙江接受了中國傳統的啟蒙教育和近代新式教育，後來為了探求救國的道路，留學日本，又受到浙籍同鄉陳其美的影響，開始了反清革命生涯。經陳其美的引薦，蔣得到孫中山的器重，特別是在孫中山最困難的時候，蔣在永豐艦上侍護孫中山達四十餘日，取得了孫中山的極大信任。一九二三年蔣介石被孫中山派往蘇俄考察軍事，歸來後被委以黃埔軍校校長的要職，在國民黨二大上蔣成為中央執行委員，進入國民黨中央領導核心。

在蔣介石權力不斷上升的過程中，浙籍的國民黨元老、理論家、金融巨頭甚至幫會骨幹給予蔣介石多方面的幫助。吳興籍的戴季陶拋出了以反共為核心的戴季陶主義，為蔣介石反共提供了理論基礎；江浙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虞洽卿組織上海金融實業界為蔣介石「清黨」提供經費；作為國民黨元老的蔡元培、張靜江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身份為蔣介石發動反共事變製造輿論；青幫頭目黃金榮、張嘯林等組織黑社會力量直接為蔣介石發動反共事變打頭陣。可見浙籍人士在蔣介石走向權力頂峰的過程中起了特殊的作用。當然，當蔣介石取得了最高權力之後，在國民黨的黨、政、軍、特等各個方面也大量起用了浙江人，據一九三五年的統計，浙江籍的特任官、簡任官、薦任官和委任官達一四五七人，僅次於江蘇省，居全國第二位。

當然，浙江在民國史上的重要性絕不僅僅因為蔣介石是浙江人和浙籍人士在國民黨內身居要職這些因素。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浙江雖然從來沒有成為過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其在全國的地位和影響無法同廣東、江蘇等省相比，但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定都南京使得中國政治中心從北方轉移到南方，浙江在國民黨的政治地理版圖上，地位相應地突出起來。以南京為中心的江浙滬地區變成了國家政權統治的強勢地帶，浙江也不再是

遠離政治中心的邊遠省份。這就決定了無論是在蔣介石走向權力頂峰的過程中還是取得最高權力之後，對浙江的重視都是空前的，在抗戰之前，浙江的確也成了國民黨能夠全面控制的為數不多的省份之一。

早在國民革命軍進入浙江之際，蔣介石為了把自己的家鄉置於絕對控制之下，就加緊扶植浙江的國民黨右派勢力，從而導致了寧波的「三二〇」事件和杭州的「三三〇」事件，這些事件是國民黨右派在浙江大規模反共事變的預演。緊接著，浙江的國民黨右派不等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共事變，就在杭州、寧波、湖州等地開始了「清黨」。伴隨著大批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被捕或被害，國民黨在浙江重新建立了省、縣各級黨部，並推行「以黨治國」的「訓政」，確立了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專制體制。但在形式上，國民黨也嘗試構建現代政府的運作模式。採取了委員制的省政府組織形式，經多次調整，形成了民政、財政、建設、教育等廳的政府系統。全省設一市七五縣，後來在全省設七個行政督察區，旨在加強省政府對縣一級的督察。在縣級以下國民黨先後實行過街村制、村里制、鄉鎮制，鄉鎮以下立保甲。國民黨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權構建，在浙江逐步確立了以黨監政、一黨獨裁的統治。但國民黨內CC系與黃埔系的矛盾使國民黨在浙江的黨、政兩大系統摩擦不斷，省政府主席及各縣縣長頻繁更替。

在國民黨統治的前十年，浙江的經濟建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國民政府對經濟的控制突出地表現在金融領域。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等四大國家銀行均在浙江建立了分支機構。其中中國銀行在浙江實力最大，在浙江地方經濟建設中起了重要作用，如閘口電廠的建設、浙贛鐵路的修建都有該行的參與。在其他經濟領域，民營經濟仍然佔據主導地位。電力工業的發展超過了此前的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交

通運輸業在十年內也成就突出，鐵路開通了杭江線，後來又貫通了浙贛全線，修建了大型鐵路公路兩用的錢塘江大橋。公路營運採取了省營、商營和省築公路租商營運等多種形式，形成了以杭州為中心的省內外運輸網路。浙江傳統的大宗產業絲綢業由於世界性經濟危機影響以及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上海等市場的萎縮，受到了較大衝擊，絲綢製品總產量下降，廠家紛紛停業，國民政府和地方政府雖採取了一些救濟措施，但作用有限，直到一九三五年下半年，隨著國際市場的復蘇才趨於好轉。浙江的城市建設在國民黨統治初期也有一定的起色。一九二七年杭州設市並作為浙江省的省會城市開始了一些市政建設，一九二九年還舉辦了聞名於世的西湖博覽會，起到了提倡和促進國貨的作用，客觀上也促進了浙江的博覽事業。

國民黨畢竟是一個代表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政權，其統治基礎非常薄弱，農村社會始終沒有引起國民黨政權的足夠重視。浙江本來就人口眾多，人均土地面積較少，再加上落後的租佃關係的長期延續，農村平民的生活異常困苦。一九二七年底，省政府決定在全省實行「二五減租」，定正產全收的百分之五十為最高租額，佃農依最高租額減百分之二十五繳租。這本是一項有助於緩解農村階級矛盾的積極的土地政策，但國民黨沒有決心將其推行到底。此舉實施不久，由於政府田賦有所減少，缺乏積極推行的熱情，業主也採取了多種辦法加以抵制，各地的實行基本上是虎頭蛇尾，未能起到緩解農村社會矛盾的作用。一九三〇年省政府又實施了浙人向東北的移民，最後僅有三〇九名浙江人移民東北，並未達到政府組織移民的初衷。

浙江歷史悠久，素有重視教育與文化的傳統。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浙江的教育與文化在全國仍具有相當的影響。經歷了一九二七年大學區制試驗的失敗，教育管理體制漸趨穩定。高等教育中，合併原來的公立工業學

校和農業專門學校，將其併入第三中山大學（後稱國立浙江大學），國立浙江大學漸成為全國的著名高等學府。在蔡元培的宣導和努力下，一九二八年，在杭州還創設了中國第一所藝術院校——國立藝術院（後稱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國民政府強調教育的主權觀念，規範了教會學校的辦學，弱化了其宗教教育功能。中等教育進一步擴大，中學數量增加，課程體系進一步完善，師範教育模式經歷了多次試驗和探索。初等教育確定了以小學教育為主的形式，一九三〇年，全省小學達一萬餘所，學生六萬餘人。另外，通過民眾教育館等形式對未受過教育的成年失學民眾開展了補充教育（社會教育），對提高民眾素質起了積極作用。

在文學領域，雖然在浙江省境內因國民黨的政治高壓文壇較為沉寂，但眾多的浙籍文學家以上海為活動舞臺，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顯示了浙籍文學家無可爭辯的優勢。文學巨擘魯迅的創作主要轉向雜文，緊扣現實鬥爭之弦，對當時社會的黑暗面給以淋漓盡致的揭露，使雜文文體成為中國文學的一種重要形式；茅盾的《子夜》成為具有深刻政治思想和精湛藝術的寫實主義代表作；一九三〇年左聯成立後，大批浙籍文學家如夏衍、殷夫、郁達夫、巴人、艾青、馮雪峰、朱鏡我、戴望舒、樓適夷等成為該組織的中堅力量；在另一個與左翼文學相對抗的文學派別「新月派」中，浙籍的梁實秋、徐志摩的文學成就也是時所公認的，特別是徐志摩的詩作具有相當高的藝術價值；此外，翻譯莎士比亞作品的朱生豪，寫歷史演義的蔡東藩也都名噪一時。

二三十年代也是浙江戲劇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發源於嵊縣的越劇，在二十年代後期女子歌班相繼組建，成為浙江戲劇的主要劇種。大批女藝人到浙江各地演出，推動了其他地方戲曲如水路京班、婺劇等劇種男女合演的普及，同時也改變了觀眾的欣賞情趣，在戲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國民黨對新聞出版採取了嚴格的控制

政策，影響最大的報紙是杭州《民國日報》（後更名為《東南日報》），它是國民黨浙江省的黨報，但採取了企業化的經營，發行擴大到東南各省。一九二七年以後浙江傳統的私家藏書樓漸呈衰勢，而公立圖書館得到較大普及，一九三六年全省有省立、市（縣）立、私立及機關所擁有的圖書館三三四館，藏書量達二二五萬冊。體育事業在這一時期僅在省城和舊府屬縣城設立了一些體育場館，但得西湖之地利，一九二九年在杭州舉辦過全國武術擂台賽，一九三〇年舉辦過民國第四屆全國運動會，省運動會也從此時開始舉辦。在醫療衛生方面，省立醫藥專門學校規模得到了擴展，各地醫學刊物大量出版，但中醫的存在面臨危機。

國民黨全國政權的建立是背叛革命的結果，這就決定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在浙江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政治鬥爭。中共是領導這種鬥爭的核心政治力量，但由於國民黨在浙江政治統治的強化，這種鬥爭在浙江的開展就變得比在其他省份更為艱難，這是浙江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史的一個顯著特點。

早在國民黨在浙江「清黨」以後，中共就在浙江成立了省委。面對國民黨的殘酷鎮壓，中共在城市組織工人罷工，在農村領導農民開展了浙東暴動、寧海亭旁暴動以及浙西、浙南的數起暴動。由於當時中共中央內「左」傾路線占主導地位，各地暴動均相繼失敗，省委機關多次遭到破壞，數位省委書記被捕遇害。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共中央不得不取消浙江省委的建制，但中共組織在各地領導的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鬥爭方興未艾，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以後，浙南一帶成立了眾多的農民武裝，一九三〇年五月，這些武裝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編為紅軍第十三軍。該軍組建後，重點進攻中心城鎮，成為浙南地區反抗國民政府統治的主要武裝力量，在客觀上牽制了國民政府軍圍剿中央蘇區的部分兵力。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了「剿撫兼施」的政策，一九三二年五月發生了「岩

頭事件」，紅軍第十三軍失敗。

一九三五年四月，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編為挺進師，從閩浙贛根據地進入浙西南地區，在與地方保安武裝不斷作戰的過程中，建立了浙西南遊擊根據地。國民政府為穩住浙江的局勢，調正規武裝展開「清剿」。十月，挺進師在福建壽甯縣鄭坑與閩東紅軍會師，成立了統一領導閩東、浙江中共組織和紅軍的機構——中共閩浙臨時省委和紅軍閩浙臨時軍區。一九三六年七月，閩浙臨時省委與中共中央取得了聯繫，根據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積極主動地展開了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一九三七年五月，國共雙方代表開始接觸，到抗戰前，經過兩次正式談判和多次非正式談判，基本上達成了停止內戰，紅軍遊擊隊北上抗日的協定。

(二)

抗日戰爭爆發後，浙江的各種政治力量得到了新的整合，一度出現了比較團結的全民抗戰形勢。隨着戰爭的進行，浙江漸形成了正面和敵後兩個戰場並存，國民黨政權、中共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日偽政權三種政權並存的局面。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軍為扭轉上海戰場的膠着狀態，從杭州灣北岸的全公亭、金山衛等地實施登陸，主力沿滬杭線推進，浙西各縣紛紛淪陷。南京市淪陷後，日軍大規模南下浙江，十二月底，浙西一市十七縣大部分淪陷，在武力侵略的過程中，日軍在浙西各地燒殺搶掠，浙西民眾奮起抗日，出現了七八十支抗日遊擊武裝。抗戰的爆發使浙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在日軍入侵浙江之際，黃紹竑第二次主政浙江，省政府遷往

永康。為了廣泛動員民眾抗日，浙江省率先在全國制定了《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成為指導浙江人民抗戰和戰時建設的綱領。在組織上，廣招進步青年，成立了以宣傳和發動群眾抗日為職責的「政治工作隊」。此外還組建了地方抗日武裝——國民抗敵自衛團，浙江出現了蓬勃的抗日局面。在經濟方面，浙西淪陷區的工商企業、學校也紛紛向尚未淪陷的浙東南地區內遷。浙江省政府還在浙東南地區重建了工業基地。在文化事業方面，原來在上海的大批浙籍文化人紛紛返回浙江，雲集金華、麗水等地，以抗日為主題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大量問世，金華成為戰時浙江的文化中心。

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是浙江正面戰場的第一期抗戰時期。這一時期前期，日軍與中國軍隊隔錢塘江對峙，國民政府軍第六二師等部在杭嘉湖地區展開對日遊擊戰爭，民眾武裝也掀起了抗日高潮。一九三九年三月，日軍向富陽富春江上的東洲沙發起進攻，國民抗敵自衛團與敵反覆爭奪，收復了東洲沙，鞏固了隔江對峙的戰局。這一時期，日軍在浙江各地人口集中的市區、車站和碼頭頻頻空襲，對佔領區平民的集體性的大屠殺也時有發生。相反，中國空軍以寧波機場為出發點遠征日本，只空投宣傳抗日的傳單，不投炸彈。一九四〇年一月，日軍偷渡錢塘江，進犯蕭山，從此打破了敵我隔江對峙的局面。同年七月，日軍又發起鎮海戰役，中國軍隊奮起抗擊，鎮海失而復得。一九四一年四月，日軍在浙東沿海分四路登陸，寧紹戰役爆發。鎮海、寧波、紹興、溫州等地陷落。

抗日戰爭初期，由於在浙江的國共關係較為和諧，中共在浙江的活動空前活躍起來。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共浙江臨時省委成立，到一九三九年七月，全省五十五個縣建立了縣委或工委，黨員從戰前的不足千人發展到二萬

餘人。不少中共黨員在「政工隊」和省、縣各級政府機構中任職，起了推動國民黨抗日的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三月，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來浙江視察，同時也向中共浙江組織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平陽召開，選出了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確定了中共在浙江新的工作目標。在軍事上，寧紹戰役後，中共決定在浙東開闢新的戰略基地，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九月，中共在浦東的武裝力量南下浙東，在開展對日遊擊作戰的過程中，建立了三北抗日遊擊根據地。

中共在浙江勢力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國民黨頑固勢力的恐懼，時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在多方面的壓力下政治立場也不斷後退。一九三九年以後，在各級政府中任職的中共黨員被迫陸續撤離，「政工隊」也被劃歸三青團，新四軍駐浙江的辦事機構有的被查封，有的被迫關閉，中共浙江省委機關也轉入秘密活動。一九四二年發生了「溫州事件」，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被捕犧牲，省委機關遭到破壞，浙江各級中共組織遭到了挫折，省委組織再次取消。

在廣大的淪陷區內，日軍實行了「以華制華」的侵略政策，相繼扶持了各級偽政權作為其工具。早在杭嘉湖地區淪陷初期，先是在各縣組建維持會，稍後，代之以地方「自治會」，一九三八年，偽維新政府在浙江成立了偽省政府，並自上而下建立了各級偽官僚機構。一九四〇年，偽省政府改隸汪偽國民政府。操縱浙江偽政權的實際上是日本在浙江設立的「浙江地區治安委員會」和「杭州特務機關」。日偽以軍事佔領為前提對淪陷區實行了全面的統治。在政治上，一九四二年以後，日軍將平湖、海鹽、嘉興劃為第一清鄉區，將杭州地區劃為第二清鄉區，將浙東餘姚等地劃為第三清鄉區，分區實施清鄉，旨在殲滅和封鎖圈內的抗日力量，加強日偽對這些區域的統

治。在經濟上，日本侵略者對浙江工商業進行了野蠻的掠奪和破壞。其「華中公司」對浙江的絲綢業實行「統制」，淪陷區的絲綢業從蠶種的選用到收購、制絲都處於其統制之下；其「華中礦業公司」則逼迫無數的浙江民工在象山等地為其開採軍工重要原料螢石；其「華中都市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華中鐵道股份有限公司」則基本上控制了淪陷區的交通運輸業；在金融領域，日軍入侵浙江的早期，主要是通過其橫濱正金銀行和臺灣銀行在浙江的分支機構廣發軍用票，通過軍用票升值的辦法掠奪財富，後來主要是通過汪偽政府的銀行來盤剝人民。在文化上，為了徹底消滅浙江人民的反抗意志，日偽在浙江大力推行奴化的宣傳和教育。

一九四二年五月，浙贛戰役爆發，這是抗日戰爭時期浙江境內最大的一次戰役，從此浙江進入了第二期抗戰階段。日軍發起浙贛戰役的導因是美國空軍利用浙贛境內的機場實施了對日本本土的空襲，因此，這次戰役也是中國為盟軍承受報復的一次戰役。由於雙方力量懸殊、中國軍隊臨時變更戰略方針等原因，中國軍隊在此役中失敗，日軍長期佔領了金華、蘭溪等地，浙江的淪陷區進一步擴大。

浙贛戰役期間，中共為進一步發展浙東敵後抗日根據地，於一九四二年七月成立了浙東區委，八月，成立了第三戰區三北遊擊司令部。中共在浙東的發展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不安，中共浙東武裝在反擊日偽「掃蕩」的同時，被迫應對國民黨頑軍的挑戰，取得了第一次反頑自衛戰的勝利，在堅持了三北遊擊區的同時，開闢了四明、會稽、金蕭三塊根據地，形成了以四明山為中心的浙東敵後抗日根據地。一九四三年十月，新四軍第十六旅挺進蘇浙皖邊區，開闢了郎廣長抗日根據地。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成為敵後抗擊日偽的主要力量。

一九四三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日益好轉，日軍為了擴大長江三角洲週邊陣地，在太湖西南發起攻